

## 城市作為翻譯政治的場域 —理論性的探索

王志弘

台灣大學

### 摘要

本文試圖令城市理論與翻譯理論對話，開創都市研究視野，以兼顧城市的異質現實與倫理關切。本文在文化表意、社會交流和新陳代謝等三個層次上，討論城市作為翻譯政治場域的特質：（1）城市是多重異質的符號化觀念與資訊溝通的翻譯場域；（2）城市是多重的制度化互動的轉譯場域；（3）城市是技術中介的多重異質之物質與能量流動的轉換場域。這裡的翻譯，除了語意翻譯，也是交流、橋接與轉化的意思，亦即令相對自主的不同體系間得以互動結合而運作，並激發新可能。當然，翻譯、橋接和轉化都不保證成功，反而常是偏誤和衝突的來源。

關鍵詞：場域、翻譯政治、翻譯理論、都市理論、行動者網絡理論

---

王志弘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E-mail: cherishu@ms32.hinet.net  
(收件：2014年12月10日，修正：2015年2月17日，接受：2015年2月22日)

ISSN 2078-4279 print / 2078-4287 online © 2015 by Open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 Vol. 6, No. 1 / March 2015

## 壹、前言：如何設想城市？

「城市是什麼？」是看似單純卻難解的問題。每個人似乎都知道，但又說不完全。規模大、密度高、異質性，是早期芝加哥學派的回答（Wirth, 1938）；縱使規模、密度和異質的取決標準眾說紛紜，但這個界定似乎掌握了城市的形式特徵。直至晚近，這依然是定義城市的基礎。例如，在《都市研究的關鍵概念》（*Key Concepts in Urban Studies*）中，Mark Gottdiener與Leslie Budd（2005:4）便界定城市為：「一個有邊界的密集居住空間，擁有相對龐大且文化異質的人口。」然而，規模、密度與異質，顯然有各種不同表現形式，我們必須釐清這些變異的根源。再者，我們很難滿足於形式化的界定，而想探知規模、密度與異質的生成動力、運作機制及可能影響，這就牽涉了都市形成與運作的理論。

標準的都市研究教科書（Short, 1996; Savage, Warde and Ward, 2003; Pacione, 2009; Flanagan, 2010; Gottdiener and Hutchison, 2011），通常會依照主題，概分為都市經濟（生產、交換、消費、產業結構等）、都市政治（社區權力、政治過程與治理等）、都市文化（心理狀態、時尚、再現等）及都市社會（階級、性別、族群關係等）等領域，接著探討都市問題（貧窮、兩極化、住宅、交通、環境危機、犯罪、恐怖主義威脅等），最後附加一個實踐導向的都市規劃與設計章節。如此一來，不免如同某些學者的評論，都市理論其實就是「現代社會」（modern society）的理論；這裡暗含了現代與傳統的時間區分，而現代都市乃對比於傳統城鎮。但是，這種歷史比較觀點，既忽略了傳統大城市的存在，也無法確實從現代與傳統的對照中，揭明「城市」或「都市」究竟是什麼。

稍後，有些學者（尤其地理學家）主張，必須關注城市的空間和地方法度，指出都市和其他社會現象一般，存在於空間中，既受到空間的塑造，也創造了空間。不過，這種呼應社會人文科學之空間轉向（spatial turn）的觀點，

雖然看似能從鄉村與城市的地理對照中，探討城市特質；但是，在當前城鄉交流頻繁密切，以及針對鄉村也可以從事空間與地方分析的情形下，依然沒能解決「城市為何」的存有論問題，甚至一門以特殊空間形式為對象的都市社會學能否成立，都遭到質疑（Saunders, 1985）。

接著，受到後現代主義和後結構主義思潮影響，部分學者基於反本質論、反基礎主義立場，主張應超越過去靜態、有邊界、強調人際互動的城市想像，而以流動、跨界、遠距連結、非人類行動者等概念來設想城市（Amin and Thrift, 2002）。城市是持續變動的過程，是流動和節點形成的關係網絡，這樣的設想在全球化的流動年代，似乎頗為合宜。Doreen Massey便主張，城市是時間與空間中，社會關係的密集焦點或節點，城市是「開放的密集體」（open intensities），是不同故事相遇的地方（Massey, 1999:102, 134）。其實，Richard Sennett溯及西方城市古典模型的古希臘城邦，便已點出了差異匯集是城市的基本特徵。他指出，城市的形成乃敬拜不同神祇的部族，為了求生存而聚居一處；這種文化異質團體的聚集共存，除了求生與經濟，也開啓了公共（public）如何構成及協調的政治與倫理問題（Sennett, 1988:82）。更晚近，部分學者援引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 ANT），提出了新的城市存有論，除了強調城市是建構而成的關係網絡，也重視「非人類行動者」（non-human actor）的作用，進而主張城市是異質元素構成、但持續變動的「拼裝體」（assemblage）（Fariás and Bender, 2010）。

綜合以上討論，我們似乎可以勾勒出城市的基本特徵，亦即：城市是一個匯聚多重存在與流動的密集異質網絡。然而，這種多重、流動、動態、異質的關係網意象，雖然頗為適合當代跨界交流頻繁的時代特徵，但似乎只是分析的出發點，而不易提供一個推展分析的依據和框架。再者，流動、跨界、遷徙、節點和網絡等意象，立即提出了不同行動者和構成元素之間如何共處、並存、接軌、對話、交流、溝通的問題，也就是翻譯（或轉譯、轉換，translation）的課題；異質城市要求著翻譯，惟其日漸密集且多元並陳，轉譯的需求也就更為

強烈。

於是，我們或許可以思索都市理論和翻譯理論之間的相遇，從中提煉出一個有助於我們掌握當前異質交錯的城市狀態或「城市—翻譯形構」（city-translation formation）的視野，作為分析經驗現象的依據。為此，後文首先提出兩個不同脈絡下的翻譯理論，先是語言學與文化批判的翻譯觀，接著是科技與社會研究（STS）脈絡下行動者網絡理論的轉換概念，藉此提出文化表意、社會互動及物質基礎等翻譯意涵與層次，以利描述城市—翻譯形構的基本狀態。接著，本文檢視都市理論的主要流派，區分為生態系統、政經形構、文化論，以及治理課題等幾個核心取向，並主張它們都預設了關係、網絡、動態、過程等觀點，亦即暗含了翻譯的必要性，卻未能提出適當分析工具，因而需要翻譯理論的補充。然後，基於翻譯理論的啟發，作者重新界定城市是一個翻譯政治場域，並提出三個層面的分析指引：城市是符號與資訊溝通的翻譯場域；城市是制度化社會互動的轉譯場域；以及，城市是技術中介之新陳代謝的轉換場域。作者最後以捷運系統作為討論實例，示範城市翻譯政治的分析方式。

## 貳、翻譯是越界與劃界的網絡化行動

我們借鑑翻譯理論來掌握城市的特質和運作，首先必須釐清何謂翻譯。直言之，翻譯是跨越邊界的行動，但越界的同時也預設和重劃了界線。劃界、越界、再劃界，既牽涉了自保謀生、溝通有無的功能性需求，也涉及了治理自我（我群）和他者（異類）之間關係的政治或權力運作，並引發了如何與異己共存的倫理實踐。功能、政治與倫理，是翻譯作為一種越界與劃界行動的核心關切。

翻譯不僅跨越了語言文字界線、意義與意向表達的界線、文化與社會界線、自我與他人的界線，還有各種制度、組織、自然和人造物質的界線。再者，翻譯作為越界的行動，也因而具有作為促進邊界內外交流的媒介效果：符

號化意義及其承載意向的交流、社會與文化模式的交通、自我與他人遭遇互動，以及制度、組織與物件的交換，都需要媒介。越界行動預設了邊界的存在，媒介則擔任邊界兩方或多方的交匯處所。邊界是異類交流、融合或衝突的所在，翻譯則捲入了這種交流、合作或衝突，更凸顯翻譯的越界行動不僅具有功能必要性，也是政治性與倫理性的。

邊界本身常是建構（construction）的結果，亦即邊界並非渾然天成，始終不變。翻譯是越界行動，是溝通邊界內外的媒介，也因此具有鞏固或形成邊界（劃界）的作用。在人類歷史中，邊界一再變動：穿透、毀壞、重建、鞏固、挪移位置。邊界定義了兩方或多方之間的差異，差異因邊界的建構而凸顯；兩方或多方作為一種範疇的存在及性質，關乎邊界如何劃定。翻譯行動既預設了邊界、劃設了邊界，也受到劃定邊界的其他力量，以及因邊界而確定的不同存在範疇的影響。簡言之，邊界、範疇與翻譯彼此互動，共同演變，並且在某些條件下形成相對穩定的運作機制或秩序，這個過程或許可以稱為「網絡化」（networking），將攸關各方利害的資源、權力、價值、意義等串接在一起而形成相對穩定的構造。

城市是密集的異質網絡，在某個意義上，正是充斥著越界、劃界和網絡化行動的場域，也就是多重翻譯行動的場域，涉及了轉譯或轉換所促生的功能運作、政治折衝，以及倫理爭議。以下，簡介兩個不同的翻譯理論學域，藉以從中獲得啟發：一個是從語言學、詮釋學、文化研究及哲學汲取養分的語言與文化翻譯學；另一個是從科學知識社會學發展而來的，行動者網絡理論的轉換社會學（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 一、翻譯政治：語言學對應、意義詮釋與文化批判

探討語言與廣義符號系統（或文化）之間如何轉換的翻譯學，歷史極為悠久。當代的翻譯理論彙編，往往會區分出不同理論學派或取向，但是有不同分法。例如，Edwin Gentzler（1993）區分出從文學翻譯中歸納經驗的美國翻

譯工作坊、講求客觀原則而汲取結構主義語言學的翻譯科學論、自成一格的翻譯研究的崛起、超越語言和文學邊界而看重社會文化環境的多元系統論，以及後結構主義哲學的影響等，幾個發展階段。Jeremy Munday（2008）則細分當代翻譯理論為「意義的對等和對等效應」、「翻譯產物與過程」、「翻譯的功能理論」、「論述和語域分析」、「系統論」、「文化與意識形態轉向」、「譯者角色論」、「翻譯哲學理論」、「新媒體論」等。陳德鴻與張南峰（2000）編撰的《西方翻譯理論精選》，則分為語文學派、詮釋學派、語言學派、目的學派、文化學派、解構學派等，顯示了從傳統文學、哲學，到語言學、文化研究，再回歸後結構主義哲學批判的轉變。揆諸Lawrence Venuti（2000）依照時代排列，收錄經典翻譯論文的彙編，大致也吻合這種演變。

我們從這些區分，大致可以歸納出翻譯理論的主要趨勢。首先，是從重視原文（original text）的意義如何有效而忠實地傳達（直譯和意譯的爭辯、意義等效的探討），轉變為位於目的語言（target language）中的譯文如何獲得接受（功能或目的導向的翻譯）。其次，是從語言文字本身的翻譯方法，轉移到重視翻譯所在的社會和文化脈絡；或者說，是從翻譯該怎麼做的規範，轉變為對於翻譯活動之過程、脈絡與影響的批判性描述，這反映於文化研究、女性主義、後殖民主義、意識形態與主體分析等取向，也顯現於「翻譯政治」這種概念的提出，強調翻譯涉及了權力關係（如Álvarez and Vidal, 1996; Simon, 1996; Bassnett and Trivedi, 1999; Venuti, 1992）。第三，尤其受到後結構主義影響，過去對於意義翻譯之精確的信念，已經轉變為關注意義的不確定性和增殖繁衍。簡言之，翻譯理論從過去以語言學為基礎的語言對應分析，轉移到詮釋學觀點下的脈絡化意義理解，以及晚近的文化批判和翻譯政治的觀點，越來越強調翻譯行動的社會、政治與經濟向度，而不止於不同語言之間的對應轉換，這樣的轉變特別有利於翻譯理論和都市研究的接軌。

總之，晚近的翻譯理論，幾乎已經和文化研究及批判哲學同義，涉足於再現政治、認同政治、族裔流離、後殖民論述，從而可以將翻譯界定為劃界與跨

界的網絡化行動了。然而，翻譯研究的關切主題與分析視野的轉變，並非意味了新出的理論必然會取代舊有的見解。相反，翻譯作為一種文學詮釋，以及關切語言意義之有效轉換的工作，仍然存在，而且有其理論化的必要。不過，相較於晚近翻譯理論對於文化、象徵、意義與再現之轉譯的批判性考察，翻譯行動所牽涉的社會制度與物質基礎，依然相對較少獲得關注。就此，我們或許可以求助於科技與社會研究領域中的行動者網絡理論，尤其是其中有關轉換（translation）和網絡形成的觀點。

## 二、行動者網絡理論（ANT）的轉換與網絡化

行動者網絡理論是由Michel Callon、Bruno Latour，以及John Law等學者發展出來的觀點，主要是提出一種含納人類及非人類的動植物、物件、工具、制度等的異質網絡，來解釋科學知識與技術的建構。若能建立網絡（亦即網絡化），並令其延伸廣遠，納入更多樣的物質與人類，來共同支持該網絡的持續運作，科學知識與技術就越能夠獲得接受、穩定下來且維持下去。

依照Callon（1986）提出的術語和分析觀點，他將這種促成知識與技術獲得接受的網絡化過程，稱為轉換的社會學。他提出了三個方法論原則，也就是不可知論（針對捲入爭議的各方行動者，必須保持不偏袒的中立）、普遍的對稱性（致力於以相同角度來解釋相互衝突的觀點），以及自由連結（放棄所有涉及自然和社會二分的先驗區別）。然後，他以法國某處海灣扇貝群落數量衰減原因的科學與經濟爭論為例，討論了三位海洋生物學家針對該扇貝保育策略的網絡化嘗試。他將這種嘗試區分為四個轉換的階段，也就是能否成功地令他們的知識計劃確立，並且獲得接受的過程。

這四個轉換階段分別是：首先，必須針對情境提出問題或問題化（problematization），也就是嘗試定義自然及自然的問題，啟動網絡化的行動者藉此讓自己對於整個情境中的其他行動者來說，變得不可或缺；同時，如果各方行動者能協調出發動者所提議方案中的「強制通行點」（obligatory passing

point），就能夠解決問題。其次，必須塑造出利害與共（*interessement*）的情況，也就是網絡化的發動者嘗試將其他行動者牢牢鎖入他們的方案所建議的角色中，並分享利害關係。第三，招募或納編（*enrolement*），這時候發動者試圖運用策略，來定義及連接他們分配給其他人的各種角色。最後則是動員（*mobilisation*），這是指發動者利用一套方法，來確保各種相關集合體所設定的代言人（這個代言人通常就是發動者自己；而代言也是一種翻譯），能夠合宜且正當地代表這些集體，而不會被其他人背叛。當然，背叛的可能也意味了轉換不見得會成功，而是以失敗告終，無法形成穩定的網絡。

簡言之，行動者網絡理論的特點，在於重視非人的行動者（*non-human actors*）在網絡形塑中發揮的作用，這有助於我們看到翻譯或轉換過程中，物質、制度與技術等的作用。再者，ANT並不認為在相對穩定的網絡形成以前，能有明確的因果推論，以及具體的個體性質及其能動性可言。ANT尤其反對科技、社會、自然之間的先驗區分，而強調任何實體其實都是在關係網絡中展演出其存在樣態；一切都是在行動或實作過程中展開的，充滿了不確定性和偶然性。然而，一旦能有效通過轉換而結盟、形成網絡，尤其是形成了鏈結（串接起異質元素的連結）特別長遠而持久的網絡，我們就能夠辨認出真實：網絡化過程便是真實的形成（*Latour, 1991*）。其實，身為法國學者的Latour，也運用了結構主義語言學概念，以連結段（*syntagmatic*）和置換段（*paradigmatic*）的語意學構造，來描繪網絡或鏈結的形成方式，指稱有效轉換的過程。網絡化便是串接各種人和非人的異質元素，形成鏈結或網絡，達致相對穩定的解決方案的歷程。就此觀點來考察前述語言學與文化批判意義下的翻譯，我們便可以將翻譯視為一種轉換、鏈結或網絡化的實作過程。

ANT觀點目前已不侷限於討論科學知識和技術如何因網絡化而獲致成功，而是廣泛應用各種社會議題，形成了一般社會理論。當前部分都市理論學者，也已援用ANT（*Amin and Thrift, 2002; Farias and Bender, 2010; Scott and Storper, 2015*），主張城市並不是有先驗性之存在或特質的實體，而是由各種元素和行

動體所拼裝而成的複合體，城市內部也有各種不同尺度的網絡，形成錯綜複雜的動態過程。這種網絡化的異質城市狀態，遂體現為持續的翻譯和轉換。結合語言學暨文化批判的翻譯觀，以及行動者網絡理論的轉換觀，我們可以掌握翻譯的不同面向，包括符號資訊的翻譯、語義的詮釋、文化的政治，以及社會與物質元素的轉換及串接等，作為重新思考城市運作的切入面。不過，接下來我們有必要概略回溯都市理論的發展，來展示翻譯政治與網絡化轉換的概念如何運用於重讀都市理論，另一方面，也藉此釐析都市研究的主要分析層次，以利於搭建一個新的都市分析架構。

### 參、城市是要求翻譯的密集異質網絡

John Rennie Short (2006) 在他的《都市理論》(*Urban Theory*) 中，先是以現代和後現代之分，提出了兩種理論化對象與模式，<sup>①</sup> 再區分出12個城市理論主題（全球化、移民、經濟、競爭、性別、情慾、政治、設計、自然、差異、混亂，以及未來城市）。不過，依照主題來整理都市理論，可能過於瑣碎，不如以基本分析模型來統整各種相似的城市概念和議題。

Peter Saunders (1985) 回顧1980年代中期以前的都市社會學理論，區分出城市是競逐資源的生態社區、城市是因規模與異質性而導致的特殊文化形式、城市是有守門人控管的資源分配系統、城市是勞動力再生產的集體消費單位，以及，城市是當代社會的縮影等不同城市模型，分別對應於芝加哥學派、新章

<sup>①</sup> 現代城市與後現代城市，以及各自對應的理論化模式，是更廣泛的社會科學與人文領域中，現代與後現代爭論的一環。簡言之，現代城市以芝加哥為代表，以生態系統、理性的資源競逐、資本積累、集體消費等概念為核心，組織起解釋城市運作的後設敘事 (meta-narrative) 或大敘事 (grand narrative)；相對的，後現代城市以洛杉磯為代表，強調片段、碎裂、多重、混亂和不確定性，懷疑大敘事的可能，並轉而關注再現、認同、影像、科技、遷移、混種文化等議題，以及它們共構的複雜都市狀態。當然，有些學者 (Cooke, 1990) 懷疑現代和後現代的二元區分是否合宜。

伯學派、新馬克思主義，以及古典社會理論等。然而，他認為以上觀點都不能確保城市是具有獨特過程的領域及理論對象；因為無論是生態社區、文化形式、資源分配或集體消費，都不局限於城市，並非專屬於城市的過程，無法據以定義城市。至於城市作為社會縮影的觀點，只是為了呈現整體的現代社會變遷；而且，國族國家是比城市更重要的空間單位，而都市問題卻無法侷限於都市本身來解答。於是，在深刻的質疑下，Saunders認為根本無法以特殊空間形式的特質來界定城市，並據以建立一門都市社會學。然而，即使有Saunders提示的城市基本定義難題，都市研究依然持續發展。

囿於寫作年代，Saunders顯然遺漏了1990年代以後，在後結構主義和文化研究影響下，有關城市作為文本、論述或再現的研究主題，以及對於混雜、跨界與多重性的強調。不過，我們可以用Saunders的分類為基礎，來掌握都市理論的主要模型和取向。再者，Saunders所提醒的，無法確認城市（空間）獨有的過程，也適用於本文倡議的城市作為翻譯政治場域的觀點，因為整個社會都可以視為翻譯政治的操作場域。不過，城市作為格外密集且異質的網絡，在交流、翻譯和轉換上的強度，確實格外鮮明。

晚近，Allen J. Scott and Michael Storper（2015）提出了另一套都市理論系譜：芝加哥學派都市社會學、馬克思主義都市理論、女性主義及對於其他社會差異之都市構成的關注、全球化城市理論、都市政治與治理、都市理論的後殖民批判（關注全球南方城市的特質，質疑西方理論的普遍性），以及，行動者網絡理論與拼裝體（*assemblage*）概念的影響。他們還嘗試以兩個軸向—聚集／極化的動態，以及區位、土地使用與人類互動的叢結—來掌握都市現象和都市化過程，並據以區別都市與其他社會現實的不同。換言之，相較於Saunders對於都市過程之獨特性的懷疑，他們試圖重建辨認都市獨特性的方法。

相對的，本文也可以視為另一種重建都市獨特性的嘗試，但不同於對聚集／極化，以及土地使用與互動叢結的重視，這裡則考察匯集在一起的異質體系及其元素之間的區劃、交流與連結，也就是翻譯和轉換的課題。再者，我們重

新審視既有的都市分析模型，其實可以看到在不同思維中的共同主題與關切，正是本文試圖凸顯的翻譯（轉譯、轉換）觀點。為此，下文既是摘述既有的都市理論視野，也是從翻譯（不同符號系統的跨界、交流、連接與轉換）角度，來重新思考這些都市理論。

### 一、生態系及其動態：城市是競逐資源 / 新陳代謝的場域

首先，芝加哥學派的Robert Park（1952），發展出人類生態學（human ecology），以植物群落的演替作為模型，掌握社會群體在城市環境中的資源競爭與功能調適動態；城市空間形式則展現為不同階級和族群通過地價、租金及購買力來競逐區位，形成區隔化的群集居住與活動模式（Park, Burgess and McKenzie, 1925）。

某個程度上，這種基於生態學的系統化動態演變模型，強調群體競爭及社區形成的過程，也是受韋伯（Max Weber）影響的新韋伯派學者（Rex, 1968; Rex and Moore, 1967; Pahl, 1975）的預設。他們將城市視為一個不平等且衝突性的資源分派系統，強調其中的政治過程，尤其資源守門人或經理人的行動，這些守門人包括了房地產仲介、地方官員、社會工作者等，控制取用住宅等策略性都市資源管道的人物。這派學者也關心，都市資源（尤其住宅）的不平等，如何成為「都市階級鬥爭」的動力（Saunders, 1985）。因此，比起芝加哥學派人類生態學對於市場中介之地租與競標能力的重視，新韋伯派更強調城市內部資源分配的制度性基礎和權力關係。

最後，相對於生態系的競爭比喻，晚近有些學者援用政治生態學（political ecology）觀點，主張必須看到自然（生態）與城市（社會）的複雜交錯，而非二元對立。因此，相較於純真的自然，複合的「都市自然」（urban nature）乃是社會—環境過程的產物和媒介，捲入了都市的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過程及權力爭鬥。於是，學者提出「社會—生態過程」（socio-ecological processes）或「都市新陳代謝」（metabolism）的概念，來掌握能量、物質、氣候、生

態、政經、社會和文化等複雜的動態變化（參見Swyngedouw, 2004; Heynen, Kaika, and Swyngedouw, 2006）。

無論是以生態系的比喻，來掌握城市內部的資源競爭機制，或者，跨越城市與自然的界線，關注含納自然與人文元素的都市新陳代謝轉化過程，都涉及了生態系或新陳代謝之各種異質構成元素之間的互動、更替和轉換，亦即牽涉了翻譯和轉換課題。市場或其他資源分配機制，都牽涉了訊息的流通與判讀；至於市場中的地租競標者，或是資源分配的守門者，則可以視為訊息接受者兼解碼判讀的翻譯者，或者在ANT觀點下，可視為嘗試問題化、招募、動員以便建立特定網絡、串接鏈條，藉以局部穩固城市秩序的發動者。

## 二、城市的政經形構：資本邏輯、調節機制、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化

相較於可能過度強調都市內部群體或經理人之能動性的觀點，政治經濟學取向的各種視角雖各有偏重，但都重視城市所在的更廣大結構性力量，並據此界定城市的功能、意義與形式。例如，柯司特（Castells, 1977, 1983）認為，城市是資本主義下，確保勞動力再生產的場域（強調城市是集體消費單位，著重考察地方政府、市民社會及都市社會運動的關聯）。另一方面，哈維（David Harvey）則認為，城市應理解為由生產或資本積累過程主導的都市過程。他指出：「城市乃是在資本積累的時間過程裡，運用勞動力營造的生產力之凝聚體。」城市奠基於面向世界市場而交換的資本主義生產的新陳代謝過程，根植於複雜的生產與分配系統（Harvey, 1985:250）。

簡言之，城市的存在與變化，乃是資本積累邏輯的表現，例如都市環境會有持續的創造性破壞，以便彌補資本主義危機（像是以房地產開發來吸收製造業的過剩資本，即所謂「空間修補」）（Harvey, 1982, 2001）。不過，資本積累及其危機的調節（regulation），或是勞動力再生產的供應和維繫，往往由國家來承擔，因而國家成為都市研究的另一項重點。至於國家是否具備相對於資本或其他社會力量動態（如勞資衝突）的自主性，或是全然順服於資本積累邏

輯，則是爭議焦點（Jessop, 2002, 2007）。

再者，1980年代以後，對於城市變遷之宏觀政經過程的關注，轉向了全球化現象，將都市動態安置於資訊科技、新國際分工，以及新自由主義化（neo-liberalization）推動的全球資本主義局勢中解釋。一方面，都市間的競爭因為資本全球移動能力升高而加劇，導致各種吸引資本的治理策略；另一方面，特定城市（或城市區域）成為關鍵的積累節點，擁有超越國家的勢力，產生了再尺度化（re-scaling）現象（原本由國家掌握的權力，因為全球化力量的穿透，部分由超國家取代，部分轉移給次國家的區域或城市）（Brenner, 2004）。

政治經濟學取向的都市理論，著重於影響都市動態之外部宏觀因果關係與內在作用機制的探討，關注資本、國家、全球化等結構性力量如何塑造城市樣貌與動態，同樣也可以視為一種系統與其異質元素之間的轉換和轉譯問題。例如，城市區域的形構可以視為一種網絡化的過程，資本與國家也可以視為特定網絡建構的發動者；或者，搭配前述有關城市作為資源競爭、新陳代謝之生態系的轉換分析，政治經濟分析則是著眼於轉換或翻譯之所以可能的結構性條件。

### 三、城市文化：城市是再現實作與認同政治的媒介與場域

文化是個複雜多義的概念，在都市理論中呈現為不同關注重點。例如，德國學者齊美爾（Simmel, 1950）認為，面對訊息繁雜、置身匿名群眾的處境，都市人會產生冷漠厭倦（blasé）心態，但又會追求時尚以便在匿名群眾中標榜個性，這顯示都市環境會促發特定生活心態、身分操作，以及文化形式。芝加哥學派的Louis Wirth發展了這個觀點，主張城市的規模、密度與異質性會激發獨特都市文化形態，呈現為膚淺、暫時、片段、功利導向的人際互動模式（Wirth, 1938），亦即當代城市是一種特殊的生活方式。

稍晚，在結構主義語言學和符號學的影響下，則有都市符號學（urban semiotics）的發展，亦即將都市環境視為由各種符號組成的文本，擁有特定符

碼規則，有待探究與解讀（Gottdiener and Lagopoulos, 1986）。這種都市符號學分析，可能展現為閃現智慧但顯得隨興的意義揭露或迷思批判（例如Barthes, 1972, 1982），也可能是嘗試建立嚴謹語義規則的分析，或進一步將符號過程納入非符號的社會與物質過程中討論（稱為社會符號學）。不過，到底該如何區劃辨識城市的符號，以及符徵與符旨之間是否明確的對應關係，或是持續滑移而難以確定都市符號的意義，則是爭議焦點。

1980年代以後，在文化研究與後結構主義思潮影響下，從都市的再現建構（King, 1996）、公共文化（Zukin, 1995）、認同政治（族群、種族、性別、性傾向、階級認同等都市構成）、流動與網絡（Amin and Thrift, 2002）等角度來分析、進而重新界定城市概念，超越了過去生態模型和政經過程所關注的物質焦點，邁向「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已成爲學術風潮。同時，隨著後結構主義，以及更晚的後殖民批判認識論而來的，就是越來越強調靜態實體、理性及西方中心觀點以外的非理性、情感、身體、不確定性、流變，以及操演（performantivity）、混雜（hybridity）、流離（diaspora）等概念（Thrift, 2008）。簡言之，城市被視爲充斥著多重再現實作和認同政治的場域，既是它們的產物，也是其運作媒介。

相較於生態動態和政經形構的解釋模型，以文化來理解城市，格外方便接軌於翻譯和轉換理論。無論城市是特殊的心靈狀態或文化生活形式，或是由眾多符號構成的文本或敘事，或者，強調城市內蘊的再現建構、認同政治及流移混雜處境，這些都市文化論的不同見解，都涉及了意義的生產、傳遞、解讀與回應，也就是牽涉了翻譯，充斥著翻譯的越界與劃界行動，以及試圖建立特定文化秩序或理解框架的網絡化轉換。

#### 四、都市治理困局及翻譯的必要性

城市是多樣且密集的人事物匯聚所在，如何調控它們之間的關係，令城市得以運作，發揮特定功能，是根本的務實問題。從都市計劃與設計、產業與交

通政策、社會福利與分配策略、都市更新與再生，以迄各種鉅型計畫、節慶和地地方行銷，都展現了都市發展與治理的複雜面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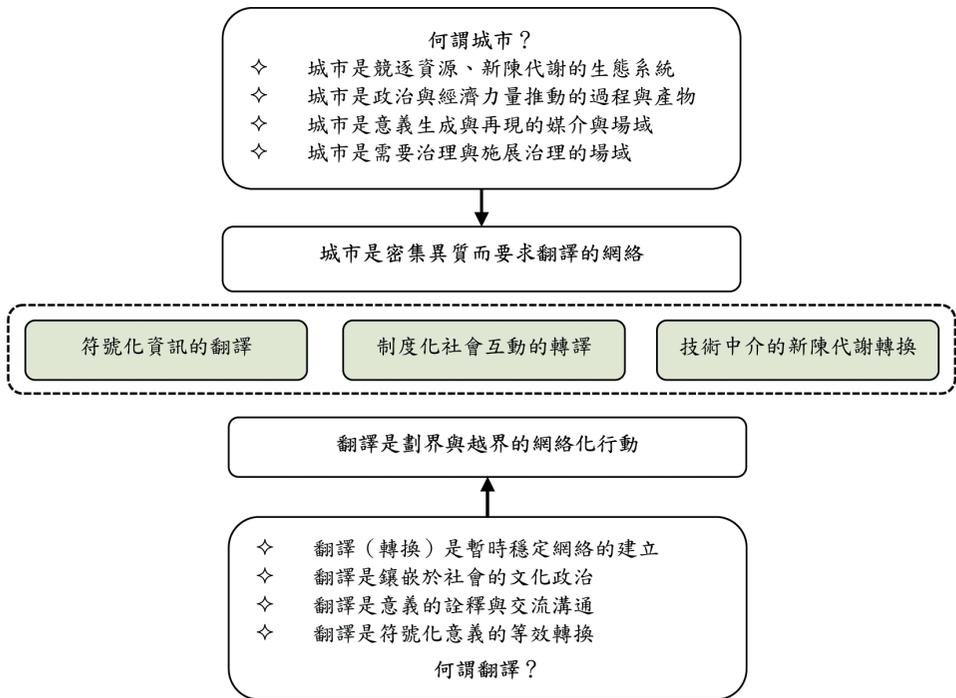
不過，就大趨勢而論，Harvey（1989）認為，面對劇烈的競爭，當代都市治理產生了從管理主義到企業主義的轉變，日漸重視以市場機制來刺激特定地方的經濟成長，而非過去重視的整個轄域的均衡發展與資源分配。至於都市治理的具體型態或機制，從早期以美國城市經驗為模型、強調地方勢力鼓吹發展的成長機器論（Logan and Molotch, 1987; Molotch, 1976），到重視各種行動者之非正式結盟與決策權力運作模式的都市政權理論（Stone, 1989），以及晚近的尺度化政治與跨域治理（Brenner, 1999, 2004），不一而足。最近，面臨全球化交流的加劇，學界也提出了「移動都市論」（mobile urbanism）的論題，討論各種都市治理政策、論述與實踐的創發、跨域傳播，以及在地調適和回應（McCann and Ward, 2011）。

這些治理模型涉及了由誰統治、如何統治，以及追求何種城市發展目標等問題，也可以視為如何轉換與翻譯各種異質元素，以謀求特定網絡或鏈結狀態。參照前述的城市理論，都市治理牽涉了如何介入以維持或改善城市作為資源競逐系統及新陳代謝循環的運作，如何調整宏觀政經力量與都市功能、形式和意義的關係，以及，如何協商不同生活方式、文化心態、認同過程及象徵意義之間的衝突，並塑造特定城市意象及其效果。於是，這一切都與翻譯有關，不同城市理論中的翻譯和轉換課題，都會轉化成為都市治理必須處理的問題。再者，都市治理也牽涉了如何將政策、論述及其宣傳有效轉換進入實際的城市運作過程。簡言之，翻譯與轉換的工作位居都市治理核心。都市是密集而異質的網絡，無論是加以分析、治理，或僅僅是在其中生活，都要求持續不歇的翻譯與轉換，以便滿足特定功能、施展權力，並引發倫理難題：於是，城市是一個翻譯政治的場域。

### 五、符號表意、制度化社會互動與技術中介之新陳代謝的三重構造

面對紛繁多樣的理論觀點，我們取其共同點，歸納出翻譯是劃界與越界的網絡化行動，而城市是密集異質且要求翻譯的網絡，替都市理論和翻譯理論的架接提供橋梁：城市是翻譯政治的場域。不過，這個一般性宣稱，還必須落實到具體的分析層次。為此，我們可以歸結前述的各種城市理論和翻譯理論觀點，形成城市作為翻譯政治場域的三層次構造，作為分析的指引（圖一）。

首先，我們將都市理論簡化為四個主要取向，亦即城市是競逐資源、新陳代謝的生態系統；城市是政治與經濟力量推動的過程與產物；城市是意義生成與再現的媒體和場域；以及，城市是要求治理和施展治理的場域。如前所述，這些取向都蘊含了不同元素之間的共存、接合、交流、轉化等翻譯行動。相對的，翻譯理論和轉換社會學所設想的翻譯或轉換，也可以歸併為翻譯是符號化



圖一 都市理論與翻譯理論的接軌

意義的等效轉換；翻譯是安置於接收端文化中的意義詮釋和溝通交流；翻譯是鑲嵌於社會權力關係中的文化政治；以及，翻譯（轉換）是穩定網絡的建立等探討取向。

其次，從城市面來看，城市可界定為密集異質而要求翻譯的網絡，翻譯則可以界定為劃界與越界的網絡化行動。然後，這些基本界定，可以參照前述都市理論和翻譯理論的取向，而展開成為三個城市作為翻譯政治場域的構造層次，分別是：符號化資訊的翻譯、制度化社會互動的轉譯，以及，技術中介的新陳代謝轉換；亦即，分別涉及城市這個翻譯政治場域的符號面、社會面及物質面。符號化資訊的翻譯，指涉了城市中既存和不斷創生的大量符號，及其所承載之觀念與資訊的不斷傳播和翻譯。城市中的符號化資訊系統有許多種，不僅是語言文字，也有影像圖畫，還包含了符號化的各種社會文本，像是人類身體和各式科技物等，也可以視為承載意義和資訊的符號，而有待翻譯。

然而，這些符號化的資訊與意義的翻譯，並非僅依憑其語法規則或符碼而運轉，而必須坐落於各種社會制度所支撐的模式化、例行化互動之中。例如，街景中各種廣告招牌上的符號或交通燈號，之所以能夠順利翻譯和運作，不僅憑依著中文或其他語言的語法規則，以及視覺圖文呈現的解碼習例，還仰賴著各種法律規範或習俗慣例（及其獎勵和懲罰手段）的存續和接受。如果不按照法律規定的規格來操作，歪讀或誤讀了燈號（失敗的翻譯），也形同是社會互動（轉譯）的失敗，這可能會引起社會互動的騷亂，以及主導秩序或其代理人的現身干預。於是，以ANT的術語來說，符號化資訊與意義的翻譯，奠基於相對穩定之網絡化秩序的形成，而這需要有效的轉譯或轉換工作，促使各方行動者能夠體察到利害與共，從而順利納編到特定網絡中而運作。

最後，我們參酌ANT對於非人類行動體的關注，以及生態系統觀對於都市自然、能量、物質等流動所構成之新陳代謝的重視，從而考慮符號化資訊翻譯，以及制度化社會互動網絡的順利轉譯，都必須仰賴各種物質，包括自然物和人造物，以及它們的順暢循環流動。這就構成了第三層的轉換場域，亦即由

適當之技術所中介的多重異質物質與能量的新陳代謝。這裡的技術不僅指涉科技如電力、內燃機、建築或治水的科技及其產物，也指稱了使各種物件得以順利轉換和網絡化的能力，換言之，技術介入正是一種翻譯（轉換）行動。

無論是符號化資訊的翻譯、制度化社會互動的轉譯，或是技術中介的物質新陳代謝轉換，都有其功能以外的政治與倫理課題，因為它們都在翻譯過程中捲入了權力關係。換言之，如何翻譯、為何而翻譯、由誰來翻譯，以及，翻譯對象會轉換成什麼模樣、翻譯被承認為有效的標準為何、翻譯有何影響等議題，都牽涉了資源分配、生命機會、社會聲望，乃至於文化正當性階序的建立與爭議，它們也涉及了吸納與排除的社會鬥爭；正因為如此，城市才是「翻譯政治」的場域。

#### 肆、城市作為翻譯政治的場域：台北捷運案例

為了闡明和示範城市作為翻譯政治場域的立論，接下來以台北捷運系統為例，簡略說明三層次構造之分析架構的可能運用及其展開的研究主題。捷運系統是當代主要城市致力營造的龐大公共基礎建設，既有順暢交通的功效，也是以大眾運輸的節能減碳宣稱來確保城市可持續發展的策略，更是提升城市地位、彰顯文明進步願景、凝聚市民認同的新公共空間（王志弘，2002；李安如，2009, 2013）。

相較於既有的諸多技術工程、管理研究及文化批判研究、捷運系統作為一個翻譯政治場域的觀點，則是本文嘗試提出的新見解。捷運系統的建立，以及搭乘捷運作為一種新都市經驗，都牽涉了不同元素的共存、接合和傳播，因而需要明顯或隱晦的翻譯及轉換行動。若從「移動都市論」的角度來看，捷運系統及其政策論述，正是全球都市規劃與設計跨界傳散的要角。這裡有著如何譯解先進技術、知識與實作，克服跨界困難與文化認知差異，再鑲嵌於本地都市

治理脈絡與社會紋理之中的諸多翻譯和轉換行動。以下則僅針對已經完成的捷運系統本身，從三個層次來討論翻譯政治場域的運作。

### 一、符號化資訊與意義的翻譯

以看似最直觀的符號化資訊之翻譯而論，其實有好幾個不同層次的翻譯，存在於捷運系統的有效運轉中。首先，以中文（國語）為主的捷運指示標誌、標語和播音，預設了且仰賴於理解中文的使用者的存在，這是有效翻譯的可能條件。再者，車廂內輪流播放站名的四種語言（國語、閩南語、客家話、英語，以及後者對照著國語的「衍生」地位），則明顯透露了語言政治的痕跡。一方面，民主化和本土化之後的族群政治，展現於公共場合的播送語言上，卻保留了國語、閩南語和客語的先後順序和階序，以及看似出於務實而失蹤的原住民語言（因為有太多族語，而使用人口極少，只在花東地區部分鐵路車站播送）。另一方面，最後播送的英語，則保障了捷運系統的國際標準規格，確保國際城市地位。雖然許多英語播音並非國語版本的完整翻譯，然而，考慮外來人口的理解能力與所需資訊，以及英文存在本身具有的象徵意義，不完整的缺漏翻譯，接續在冗長的站名播報後頭，反而有其必要。

其次，圖案與顏色為主的符號化資訊系統，像是禁止飲食的黃色標線、月台的停止線和排隊線、營運路線的顏色區分、各種尺度和功能的地圖，以及廣告招牌等。這些視覺圖樣雖然經常有文字輔助（以文譯圖，或以圖譯文），但其本身的語法規則較不精確，新來乍到的使用者，往往難以確認或逕予忽略。至於熟練的使用者，幾乎無須翻譯，或是已經將其符碼規則內化到認知圖中，成為身體習慣而宛如不需譯解了。但是，在系統比較複雜的地方，像是轉運站，尤其台北轉運站，圖文指示系統似乎對不少使用者依然是個翻譯難題；腦海和身體中的認知慣行，無法跟指示系統的邏輯接軌。原因之一可能是位於地底的通道模樣都很類似，又缺乏眾人熟悉的地面高低起伏的明顯地標，徒有抽象化的指引系統，也不易奏效。這裡產生了明晰性或可辨識性問題，也就是實

際地理與心靈認知之間的轉譯問題。

最後，捷運系統，尤其站體、軌道和地下街通道，也可以視為由符號構成的文本。例如，不同站體設計訴說著不同的觀念與意義。淡水站的紅磚風格、劍潭站的龍舟造型、中正紀念堂站與周邊地景搭配的出口，文湖線的透明簡潔風格，都明顯傳達出特定意義，並成為城市中宛如雕塑的地標，發揮了替各處街區錨定意義的作用。當然，有效的翻譯端賴於能適當解讀空間文本的使用者；但是，此處的建築空間符碼較為模糊，因而容許多樣的譯解方式。此外，在站體、軌道及地下街內部，都還有更細緻的局部空間文本，如車票販售機、電扶梯、商家、街舞練習者、書報筒、刻意維持的角落小花園，以及或移動或停駐的各種人體，鋪陳且誘引著異質而多重的訊息，並要求合宜的言行。它們相互交錯、碰撞、衝突或協調，交織成為城市韻律的節奏，或者說，異質元素之間隱然有著有效轉換下的網絡化鏈結。在這種有效翻譯和轉換的秩序裡，無法快速譯解符號化資訊的不熟練或不合宜使用者，往往處於尷尬、迷惑、甚至危險或遭致排除的境地。

## 二、制度化社會互動的轉譯

符號化資訊的溝通與翻譯，導引了捷運系統中人群的言行舉止。然而，若冀求至少有足夠比例的人群（使用者、捷運員工及其他人員）舉止合宜，以利捷運系統順利運作，則還需要考慮符號化資訊翻譯的社會制度支持，以及這種制度化社會互動本身的有效轉譯。

首先，捷運空間的使用方式受到明文規定的規章條款規範，包括規範捷運公司和旅客雙方權利義務的定型化契約、空間租用法規、大眾運輸法令，以及規範著維修、清潔和站務人員言行的其他規約。如何令這些符號化資訊有效轉譯成為合宜的例行化社會互動，實有賴於相關機構和人員的執法及獎懲施行，以及，相關人員對於這些符號化資訊的有效譯解。

其次，許多捷運時空中的言行，並無明文規範，卻依然大致按照著不妨礙

或有益於捷運系統運轉的方式進展，這就牽涉了默認的社會慣例、習俗、道德的有效轉譯或網絡化。例如，街舞團體會尋找合適的地下道空間來練舞，注意他們與一般旅客的適當距離，避開站務人員監督，或是與之協商取得認可。或如捷運車廂中或月台上，人與人之間會維繫合宜的距離和舉止，像是旅客不多的時候，人群會相對分散站立，以便保持陌生人之間，不具敵意且能保持隱私的距離。相對的，陌生人若彼此緊靠而立，則會引發緊張和衝突。

另一方面，許多違反社會慣例和道德的言行，如酒醉、暴露身體、猥褻或性行為、傷人、跳軌自殺等，則會立即引起反應，尤其是眾人期待必須有所回應的站務員、警察等執法人員的迅速反應（有效的訊息轉譯）。在重大事件衝擊了捷運系統的順利運轉（如隨機殺人事件）時，系統內部就必須添加許多安全元素（高密度的警察巡邏、車廂內指示如何應付突發事件的標語），使用者也改變其例行化行為（減少沉睡、使用手機，準備好雨傘等防身物品），共同將發生轉譯困難的捷運系統，調節回到可以轉譯而協調運轉的狀態，或者說，重啓一個有效的網絡化過程。

第三，我們也可以觀察到許多規範形成後的定型化，宛如一種新生活方式而堪稱為文化（模式化的價值與言行）。例如，早期捷運公司曾大力宣傳電扶梯使用規則：靠右站立，左邊通行。但後來為了避免快速通行反而造成危險，改為宣導緊握扶手、站穩踏階。但是，已然將早期規範轉譯為身體慣行，並形成默認之道德規範的使用者，卻不容易更動其言行模式，甚至形成了一股將新來乍到者馴化的慣性力量。更甚者，這種身體秩序在備受好評下，轉化成為台北市或台灣人有禮節、守秩序的換喻或縮影。換言之，這種制度化的社會互動，轉譯成為捷運文化的表徵，再轉譯成為台灣社會的一種刻板形象，甚至成為某種市民的自我規訓式的認同。前述的各種規範性轉譯，當然都有其吸納和排除的邏輯，從而致生了緊張關係。

### 三、技術中介之新陳代謝的轉換

捷運系統的順利運轉，也取決於眾多的科技物、物質和能源，以及它們的順利供應、循環與搭配。電力系統、電腦控制系統、軌道與場站結構、空調系統、給水與排水，以及垃圾收集和清理等，各種系統之間必須相互協調；它們各自的內部，又包含許多必須相互協調的元素，也就是必須有適當的轉換機制，令其其間的循環得以運轉。不過，這些系統及其內部元素的生命周期或循環週期，並不一致（例如，有不同的預定使用年限、侵蝕狀態，因而有不同的更換檢修期程），經常引起搭配（轉換）上的困難。或者，不同技術系統或能源轉換循環之間，有著接軌或介面問題。例如，從木柵線延伸為文湖線，不僅是單純的營運路線延長，也涉及了不同系統之間的接軌、協調和轉換，以便形成穩定的網絡化方能運轉。更甚者，物質與能源的新陳代謝和循環，其實延伸超越了捷運系統本身，跨越了城市邊界，而展布於整個區域、甚至是整個地球；任何一個流通的環節出差錯，翻譯或轉換錯誤、斷裂、脫落、崩解，就可能造成捷運系統新陳代謝上的難題。

再者，這些技術中介的新陳代謝轉換，其實仰賴且共構於前述的符號化資訊翻譯，以及制度化社會互動轉換，方能進展。換言之，某個方面看，技術中介的物質與能量之新陳代謝，是符號化資訊翻譯和制度化社會互動轉譯的基礎（物質支持了社會與認知）；但是，換個方向看，符號化資訊翻譯和制度化社會互動轉譯的有效運作，才令技術中介的新陳代謝轉換循環得以存在。

例如，捷運系統的物質性存在之前，必須要有政策、規劃和設計的諸多階段，涉及了公共資源分配、規劃論述的宣揚和爭議，也就是要有符號化資訊的適當翻譯，以及制度化社會互動的協商轉換，才能建構令捷運系統得以實現的網絡化。以ANT術語來說，就是必須先問題化（捷運系統成為解決交通問題的強制通行點）、建立利害與共的認知，召喚和納編各方行動者的角色並加以協調整合，最終必須由技術官僚或政治人物來擔任捷運興建方案的代言人，並確保不受背叛或推翻。如此，從擬議籌畫到初期路網的逐步成形，也經過了數十

年漫長轉換過程，涉及諸多利益、價值、資源的權力爭奪和意識形態爭論。

綜合前述，台北捷運系統的運轉部署於多層次的符號化資訊翻譯、制度化社會互動轉譯，以及技術中介之新陳代謝的轉換中，其有效運轉或治理乃仰賴於有效的翻譯。但是，翻譯總是牽涉了單純認知、交換、連結功能以外的權力運作與資源分配，亦即涉及了政治與倫理。若說翻譯是劃界和跨界的網絡化行動，而城市是翻譯政治的場域，那麼，顯然捷運系統及整個城市都是急迫需要翻譯和轉換的密集異質網絡，而其有效治理卻難免於排除性的劃界、壓抑雜音，嘗試構成統整一貫的網絡秩序，卻又可能產生脫節、分歧、轉換失敗、鏈結斷落的情況。於是，循著翻譯、轉譯與轉換的行動，我們得以窺見城市的核心特徵、運作機轉，以及政治與倫理。

## 伍、結論

本文主張，翻譯和轉換乃是當前都市作為密集而異質的多重網絡，在運作和治理上的功能必要性，也彰顯了都市生活的政治與倫理意涵，就此，城市可以重新界定為翻譯政治的場域。美國法學家James Boyd White（1990）曾明確指出翻譯的倫理與政治意蘊：

翻譯意味了面對文本、語言、人群之間無法橋接的不連續狀態。因此，翻譯不僅有知性向度，也有倫理向度。翻譯承認了他者—源出文本的編撰者—是自身以外的意義中心。翻譯要求我們發覺他者語言的價值，以及我們自身語言的限制。良好的翻譯因而不只是由支配和獲取的動機所推動，而是由尊敬所推動。翻譯指的是，我們學習與差異共存、學習與文化的流變共存，以及學習與自我的不穩定共存的一整套實作（White, 1990:257）。

在當代城市的多元異質生活中，與差異、變動和不確定性共存，正是個人

生存、集體生活與公共治理的要務。於是，我們將城市視為有待翻譯的密集異質網絡，而將翻譯視為劃界與跨界的網絡化行動，便可以從都市理論與翻譯理論的接軌中，獲得不少啟發。

這種視城市為翻譯政治場域的觀點，還有待更多經驗研究的檢證和深化，也有可能擴張而成為一般社會理論的視野。不過，如果本文的描述和例證，有偏向於呈現系統如何運作的描述（how），而較少討論何以致此、導向何方的因果解釋（why），那麼，我們或許也需要進一步探索，翻譯必要性的根源中所蘊含的道德、倫理和正義問題。換言之，有效的翻譯如何進行的考察，還是必須搭配誰能翻譯、由誰來翻譯、翻譯的影響如何，以及為了什麼原因而翻譯的批判性思考。如此，才是將城市界定為翻譯政治場域的本意。

## 參考文獻

- 王志弘 (2002)。〈流動地景與時空操演—臺北捷運系統與新都市經驗〉，《地理學報》，第31期，頁83-115。
- (Chih-Hung Wang [2002]. "Landscape of Flows and Spatial-Temporal Performances: New Urban Experiences through Taipei MRT."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No. 32:83-115.)
- 李安如 (2009)。〈地鐵作為「文化親密」的空間—以臺北市大眾捷運系統為例〉，《考古人類學刊》，第70期，頁79-108。
- (An-Ru Lee [2009]. "Subways as A Space of Cultural Intimacy: The Mass Rapid Transit System in Taipei, Taiw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No. 70:79-108.)
- \_\_\_\_\_ (2013)。〈地方、認同和想像地理—高雄大眾捷運系統的文化政治〉，《台灣人類學刊》，第11卷，第1期，頁93-122。
- (\_\_\_\_\_ [2013]. "Place, Identity, and Imagined Geography: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the Mass Rapid Transit System in Kaohsiung, Taiwan." *Taiw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Vol. 11, No. 1:93-122.)
- 陳德鴻、張南峰 (編) (2000)。《西方翻譯理論精選》。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 (De-Hong Chen and Nan-Feng Zhang (eds.) [2000]. *Western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 Álvarez, Román and M. Carmen-Africa Vidal (eds.) (1996). *Translation, Power, Subversion*. Clevedon, UK: Multilingual Matters.
- Amin, Ash and Nigel Thrift (2002). *Cities: Reimagining the Urban*.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Barthes, Roland (1972). *Mythologies*. New York: Hill and Wang.
- \_\_\_\_\_ (1982). *Empire of Signs*. New York: Hill and Wang.
- Bassnett, Susan and Harish Trivedi (eds.) (1999).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Routledge.
- Brenner, Neil (1999). "Globalisation as Reterritorialisation: the Re-Scaling of Urban Governance in the European Union." *Urban Studies*, Vol. 36, No. 3:431-451.
- \_\_\_\_\_ (2004). *New State Spaces: Urban Governance and the Rescaling of Statehood*.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allon, Michel (1986). "Some Elements of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Domestication of the Scallops and the Fishermen of St. Brieuc Bay." In John Law (ed.), *Power, Action and Belief: A New Sociology of Knowledge?* (pp. 196-223). London: Routledge.
- Castells, Manuel (1977). *The Urban Question*.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_\_\_\_\_ (1983). *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 A Cross-Cultural Theory of Urban Social Movement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ooke, Philip (1990). "Modern Urban Theory in Question."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New Series*, Vol. 15, No. 3:331-343.

- Fariás, Ignacio and Thomas Bender (eds.) (2010). *Urban Assemblages: How Actor-Network Theory Changes Urban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 Flanagan, William G. (2010). *Urban Sociology: Images and Structure, 5<sup>th</sup> edition*.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 Gentzler, Edwin (1993).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London: Routledge.
- Gottdiener, Mark and Alexandros Ph. Lagopoulos (eds.) (1986). *The City and the Sign: An Introduction to Urban Semio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Gottdiener, Mark and Leslie Budd (2005). *Key Concepts in Urban Studies*. London: Sage.
- Gottdiener, Mark and Ray Hutchison (2011). *The New Urban Sociology, 4<sup>th</sup> edi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Harvey, David (1982).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_\_\_\_\_ (1985). *Consciousness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_\_\_\_\_ (1989). "From Managerialism to Entrepreneurialism: The Transformation in Urban Governance in Late Capitalism." *Geografiska Annaler. Series B, Human Geography*, Vol. 71, No. 2:3-17.
- \_\_\_\_\_ (2001). "Globalization and the 'Spatial Fix'." *Geographische Revue*, No. 2:23-30.
- Heynen, Nikalos, Maria Kaika, and Erik Swyngedouw (2006). *In the Nature of Cities: Urban Political Ecology and the Politics of Urban Metabolism*. London: Routledge.
- Jessop, Bob (2002). *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_\_\_\_\_ (2007). *State Power*.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King, Anthony (ed.) (1996). *Re-Presenting the City: Ethnicity, Capital and Culture in 21st-Century Metropolis*. Hampshire, UK: Macmillan.
- Latour, Bruno (1991). "Technology is Society Made Durable." In John Law (ed.), *A Sociology of Monsters: Essays on Power, Technology and Domination* (pp. 103-131). London: Routledge.
- Logan, J. R. and H. L. Molotch (1987). *Urban Fortune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lac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assey, Doreen (1999). "Cities in the World." In Doreen Massey, John Allen and Steve Pile (eds.), *City Worlds* (pp. 99-156). London: Routledge.
- McCann, Eugene and Kevin Ward (eds.) (2011). *Mobile Urbanism: Cities and Policymaking in the Global Age*.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Molotch, H. (1976). "The City as A Growth Machine: Towards a Political Economy of Plac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No. 82:309-332.
- Munday, Jeremy (2008).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London: Routledge.
- Pacione, Michael (2009). *Urban Geography: A Global Perspective, 2<sup>nd</sup>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 Pahl, Ray E. (1975). *Whose City? 2<sup>nd</sup> edition*. UK: Penguin.
- Park, Robert E. (1952). *Human Communities: The City and Human Ecology*. New York: Free Press.

- Park, Robert E., Ernest W. Burgess and Roderick D. McKenzie (1925). *The City: Suggestions for Investigations of Human Behavior in the Urban Environment*.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Rex, John (1968). "The Sociology of a Zone of Transition." In Ray E. Pahl (ed.), *Readings in Urban Sociology* (pp. 211-231). Oxford: Pergamon Press.
- Rex, John and Robert Moore (1967). *Race, Community and Conflic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aunders, Peter (1985). "Space, the City and Urban Sociology." In D. Gregory and J. Urry (eds.), *Social Relations and Spatial Structures* (pp. 67-89).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Savage, Mike, Alan Warde, and Kevin Ward (2003). *Urban Sociology, Capitalism and Modernity*, 2<sup>nd</sup> edition. Hampshire, UK: The Macmillan Press.
- Scott, Allen, J. and Michael Storper (2015). "The Nature of Cities: The Scope and Limits of Urban The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Vol. 39, No. 1:1-15.
- Sennett, Richard (1988). "The Civitas of Seeing." *Place*, Vol. 5, No. 4:82-84.
- Short, John Rennie (1996). *Urban Order: An Introduction to Urban Geography*. Malden, MA: Blackwell.
- \_\_\_\_\_ (2006). *Urban Theory: A Critical Assessment*. Hampshire, UK: Palgrave Macmillan.
- Simmel, Georg (1950). "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 In Kurt Wolff (ed.),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pp. 409-424). New York: Free Press.
- Simon, Sherry (1996). *Gender in Translation: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 London: Routledge.
- Stone, Clarence N. (1989). *Regime Politics: Governing Atlanta 1946-1988*. Kansa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 Swyngedouw, Erik (2004). *Social Power and the Urbanization of Water: Flows of Pow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hrift, Nigel (2008). *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 Space, Politics, Affect*. London: Routledge.
- Venuti, Lawrence (ed.) (1992). *Rethinking Translation: Discourse, Subjectivity, Ideology*. London: Routledge.
- \_\_\_\_\_ (2000).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 White, James Boyd (1990). *Justice as Translation: An Essay in Cultural and Legal Critic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irth, Louis (1938). "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44, No. 1:1-24.
- Zukin, Sharon (1995). *The Cultures of Cities*. Cambridge, UK: Blackwell.

# City as A Field of Translation Politics: A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Chih-Hung Wang*

## Abstract

This article tries to initiate a new perspective on urban theory by bringing it into a dialogue with translation theory, and thereby takes the heterogeneous reality and ethic concerns within a city into account. Cultural expression, social exchange, and metabolism are the three aspects which will be analyzed in this research to buil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se two theories. Taking this as a foundation, this article then begins a discussion on the qualities of translation field within a city focusing on three aspects: 1) A city is a field where symbolized concepts of manifold and heterogeneous quality and communication of information are translated between each other; 2) A city is a field where multiple structuralized interactions and routine activities are converted; 3) A city is a field where multiple heterogeneous materials mediated by technologies and the circulation of energy are transmuted. Translation here goes beyond semantics to suggest exchange, bridging, and conversion. It indicates that different yet relatively independent systems can work properly by cooperatively combining together, in which new possibility might be triggered. However, the exchange, bridging, and conversion might also fail and turns out to cause bias, distortion, and conflicts.

**Keywords:** field, translation politics, translation theory, urban theory, actor-network theory.

---

**Chih-Hung Wang** is Professor of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cherishu@ms32.hinet.net>